

北宋前期宋夏关系对北宋吐蕃招抚政策的影响

张雅静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北宋前期,西夏的崛起迫使宋廷不得不改变对吐蕃的政策,宋廷积极招抚吐蕃,试图实施联蕃制夏策略,从而争取宋夏对峙中的主动权。在军事、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北宋对吐蕃采取了综合经制的招抚政策,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受宋、夏、蕃三者错综复杂的争夺形势的影响,同时受限于宋王朝招抚政策所具有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宋蕃之间的合作是脆弱与短暂的。

关键词:北宋前期;吐蕃;西夏;招抚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1)06-0098-04

北宋前期对吐蕃的招抚,是当时西北地区宋、夏、蕃三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斗争的直接产物。西夏的崛起与强大使得宋夏关系日渐紧张,北宋王朝出于自身安全与利益的考虑,积极招抚吐蕃,以期达到联蕃制夏的目的。宋夏关系的变化促使宋廷调整对蕃政策,联蕃制夏则暂时缓解了北宋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北宋、西夏、吐蕃三种政治势力相互制约与制衡,这充分反映出北宋前期西北地区政治与民族关系的复杂情态。北宋对吐蕃之招抚,是其实施联蕃制夏方略的重要步骤。刘建丽先生对宋蕃关系多有研究,在《宋代西北吐蕃》、《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略论西北吐蕃与北宋的关系》、《略论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等论著中,她提出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是北宋、辽、西夏、吐蕃等势力相互消长和制衡的产物;宋朝经制吐蕃而吐蕃归属的深层原因在于吐蕃经济、政治、军事上对北宋的依附以及文化心理上对中原王朝的认同。顾吉辰在《北宋时期的吐蕃政权与周邻的关系》一文中探讨了宋夏关系对宋蕃关系的制约与影响。杨文、高小强在《试论西夏政权对北宋经略河湟区域民族政策的影响》一文中分析了西夏对北宋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阐明了北宋“联蕃制夏”的原因。不过,现有研究多侧重对宋、夏、蕃三者关系的发展变化进行长时段的宏观的概括总结,在某些细部环节方面还有待于深入的挖掘与探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对宋、夏、蕃三者关系发展变化等情况均有比较翔实的记载,在研究北宋招抚吐蕃这个问题上,其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本文主要以《宋史·吐蕃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为主要考察依据,在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和参稽各种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拟对北宋前期招抚吐蕃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分析。

北宋建国之初,面临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北宋王朝将防范和镇压人民反抗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所谓“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如何处理与周边各族的关系则降至次要位置。在对待吐蕃问题上,宋王朝更是摆出了“置之度外,存而勿论”的漠然姿态。

但是,随着宋辽澶渊之盟的签订,北宋与契丹的关系趋于缓和,宋与党项的关系却迅速恶化。自李

收稿日期:2011-05-20

作者简介:张雅静(1966-),女,河北唐山人,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教育(历史)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高等职业教育。

唐王朝封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随后赐姓李,封夏国公开始,拓跋思恭及其后代对中原政权皆“俯首称臣”。宋太祖时期,削夺藩镇兵权,对西北少数民族依然宽宥,“许之世袭”。10世纪后期,党项迅速崛起,其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日渐扩大。982年,宋太宗赵光义削藩镇的兵权,准备根除党项势力,李继迁率众在地斤泽集合武装,走上了公开抗宋之路。1002年,李继迁攻陷灵州。灵州位于夏州西侧,倚重贺兰山,带引黄河,“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至此,宋朝西部失去了藩篱。1038年,元昊称帝,建立大夏政权,史称西夏。元昊称帝宣告了宋夏关系正式破裂。西夏建国后,党项势力不断发展,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显而易见,党项已经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加之向外扩张又是西夏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西夏很快便走上了大规模的战争之路,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与经济诉求。西夏的扩张引发了周邻政权的警惕,夏宋、夏蕃关系日益紧张起来,与之相应,宋蕃关系亦发生了重大调整:北宋御边需要借助吐蕃之力牵制西夏,而力量相对弱小的吐蕃也需要借助北宋以对抗西夏的扩张,以此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唐末,吐蕃政权崩溃,各部割据自立,处在“种族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的孱弱状态。历经五代直到宋初,分散的吐蕃各部逐渐走向联合,凉州的吐蕃六谷部,湟水的唃廝囉部先后强大起来。1004年,党项族人李继迁攻下凉州后,潘罗支集六谷部及邻近者龙族进行反击,取得大胜。1035年,元昊攻破唃廝囉猫牛城,进而又攻青唐等地,唃廝囉率吐蕃诸族设计抵御,“数以奇计破元昊,元昊遂不敢窥其境。”夏蕃交恶,西夏屡屡失利,这表明吐蕃亦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概言之,北宋是一积贫积弱的大国,新兴的西夏咄咄逼人,在双方形成均势之时,周旋于宋夏之间的吐蕃便成为打破平衡的关键。自太宗朝始,北宋便对吐蕃进行积极的招抚。

二

宋廷深谙“所谓招抚者,非饮食不足以得其欢,非赏赐不足以回其意”。招抚就是利用,只有先安抚,而后方能利用。为了实现招抚吐蕃的目的,北宋充分利用了中原王朝与吐蕃传统的宗藩关系与夏蕃之间既已存在的矛盾,对吐蕃采取既打又拉的策略。吐蕃则审时度势,为谋求自身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巧妙地周旋于宋夏之间,并不断接受宋的封赐,大量附宋。吐蕃附宋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夏蕃之间的矛盾,吐蕃或为摆脱夏的剥削,或因惧夏而附宋。临占附宋即属于此种情况。临占,世居古渭州,因在边地掠取西夏的牛羊,蕃夏之间产生了冲突。西夏准备攻打临占,临占惧力不敌,因此献地附宋。二是宋的招抚,这是吐蕃大规模归附北宋的直接原因。在正史、长编等史书中,沿边蕃部内附归化与入贡的记载俯拾皆是。北宋抚蕃策略具有综合经制的鲜明特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

政治上,“爵赏荣耀以诱之”。宋王朝致力于与吐蕃各部的宗藩关系,累世不辍。凡是投诚归向、或纳质归化的吐蕃部落首领,宋廷都“啖之以官爵”,授予官职,是宋廷对蕃部首领在当地统治权的认可,这样蕃部既赢得了宋廷的信任,又有助于提升自身的政治威望,从而为蕃部大规模归宋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宋多次对六谷部首领封官,1003年,真宗授六谷部首领潘罗支“朔方节度使、灵州西南都巡检使”。1004年,潘罗支遇害身亡,其弟厮铎督继立为首领,真宗授厮铎督为盐州防御使、灵州西南沿边都大巡检使,旋又加封为朔方军节度、押蕃落等使、西凉府六谷大首领。宋朝与河湟吐蕃政权首领也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宋多次赐号予唃廝囉。1032年,仁宗授唃廝囉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1038年,又加授其保顺军节度使,仍兼邈川大首领,“后累加恩兼保顺、河西节度使、洮凉两州刺史”等。唃廝囉死后,北宋遵从前制,继续授予唃廝囉的继承人董毡封号。不仅如此,对众多来归的较小蕃部首领,宋朝也以官爵授之。1004年,“陇山外至王家、利家、延家三族归顺,诏授其首领官”。1018年,樊家族九门都首领开斯多卜并其族来归,诏“补开斯多卜为都军主,余署职有差”。这样,在西北沿边一代,出现了诸多“蕃官”。为了调动这些蕃部更好地效力,宋廷对有功者进行奖赏。临占附宋后,为古渭州分巡检,月俸钱五升,宋许诺“若一年能弹压蕃部,即授顺州刺史”。1054年,“古渭州沙克精谷部蕃部相攻,而吐蕃辖戡尝领众以授官军……颇有向化之心”。宋廷对此给予优厚的赏赐,“月增大彩五匹、角茶五斤;妻李萨勒与封邑号;旧军主李觉萨与转都军主,月增大彩三匹、角茶三斤;兄蕃僧遵锥格与赐紫,月给小彩

一匹,散茶三斤”。在宋廷的诏诱下,众多的蕃部归向宋朝,而且乐为宋用,他们成为宋王朝抗御西夏,保护边疆的重要劲旅。

经济上,赐资帑帛,安定蕃民。西北吐蕃在经济上对宋王朝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宋朝方面“掌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宋蕃双方的茶马贸易始终保持着。与此同时,宋朝认识到“蕃戎靡小,贪慕财贿”,因此常常对西北吐蕃“诱之以货财”。一方面,给大小蕃官提供优厚的回赐、俸禄。1002年,潘罗支贡马,宋朝除厚给马价外,“别赐彩百段,茶百斤”。1025年,诏赐李立遵俸钱,每月给衣着五十匹、茶五十斤。而且,回赐的物品主要又是吐蕃急需的丝帛、茶叶等。另一方面,宋廷认识到经济上的不稳定是导致吐蕃叛附无常的关键。因此,除在沿边继续开展互市贸易外,宋廷还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安置措施。为了解决“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致单弱不能自存,因没虏中”这一难题,宋廷采纳了曹玮的建议:“还其故田,后有犯者,迁其家内地。所募弓箭手,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予田二顷。再更秋获,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田五十亩。”真宗景德年间,“蕃部多疾,宋赐其百龙、犀角、硫磺、安息香、百紫石英等药”,及时缓解了吐蕃人民的病痛危难。

军事上,筑城建堡,保护蕃民安全。随着西夏的兴起和北宋防御重心的逐渐西移,蕃民分布的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一带,成为西夏频频入侵之地,构筑城关堡寨既是威慑、攻御西夏的需要,同时也成为争夺、保护蕃民的重大举措。1043年,吐蕃大汪家族元宁献水洛城,“田肥沃广数百里,杂氏十余落无所役属……若就其地筑城,可得蕃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显而易见,蕃民是宋廷御边的重要力量。从宋太宗时起,北宋在西北沿边构筑的大量城关堡寨不仅保护了宋沿边汉族边民,也保护了沿边内附蕃民的安全。1046年,宋认为秦州夕阳镇“当伏羌、永宁两路之隘”,于是在夕阳镇修筑一寨,“置兵戍守,缓急有警,收旁近蕃汉老幼孳畜而入保之,实为经久之利”。另外,宋朝国势积弱,有“弓矢兵器不入外夷”的规定,而对六谷部却破例赐给弓箭和其他武器,以增强其武备力量。

三

实际上,在北宋大力招抚吐蕃的同时,西夏也不甘示弱。早在李继迁统治时期,党项便确立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鹑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的战略方针。1002年,李继迁曾遣使诏诱西凉府的吐蕃部落,遭到大首领潘罗支的断然拒绝。随后20余年间,党项坚持不懈地对河西吐蕃用兵,直到1026年,最终征服了河西吐蕃。接着,党项又把军事斗争的矛头转向以今青海西宁为中心的河湟吐蕃唃廝囉政权。元昊立国及其谅祚当政期间,西夏把向四邻扩张视为国策,唃廝囉希望借助宋的力量与西夏周旋,西夏为了解除南下攻宋的后顾之忧,竭力控制河湟,力图打破宋与唃廝囉的联盟。1038年,元昊利用河湟吐蕃首领唃廝囉父子的矛盾,诏诱其部落,元昊“阴以重贿间之,且诱诸酋归附,有温逋哥子一声金龙,拥众万余叛附元昊,结为姻婚,唃廝囉势蹙”。同年,元昊还曾与蕃部诸酋结盟于贺兰山,相约共同进攻北宋。但是,从宋蕃与夏蕃合作的规模与程看,宋对吐蕃的招抚远比夏蕃合作更加富有成效。

北宋前期,宋廷对吐蕃的招抚对宋蕃双方都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对于宋朝而言,吐蕃大量附宋并经常采取军事行动,配合北宋牵制西夏,在一定程度上,宋廷实现了抚而有之的意图。1003年,潘罗支率领军队在凉州杀死李继迁,给西夏以重创。1039年,宋遣左侍禁鲁经持仁宗诏赴唃廝囉,“使击元昊以披其势,赐帛二万匹”。唃廝囉立即出兵四万余人,击西夏之西凉府。因西夏守军有备,唃廝囉“捕杀游逻数十人,亟还”,但“声言图再举”。时宋臣孙甫针对西夏的乞盟,曾上言:“自元昊拒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廝囉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另一方面,对于吐蕃而言,作为宋、夏、蕃三方角逐中相对弱小的政治力量,吐蕃同样渴望与宋朝合作。北宋重贿吐蕃的财物源源西运,大量的边贸促进了吐蕃的繁荣与发展。特别重要的是,在宋的支持下,唃廝囉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中赢得了自立发展的空间。随着宋蕃政治与经济往来的日益频繁与深入,双方加深了彼此的认识与认同,李继迁令人招抚环州熟仓族首领游遇,他甚至回答说:“吾一心向汉,誓死不移。”这样一种情感有助于增进宋蕃之间的民族融合与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个事实,宋夏关系的变化是制约宋蕃与夏蕃亲疏的关键因素:“每当宋夏关系由紧张转为松弛时,宋对吐蕃关系出现淡化,此时西夏乘虚而入,向吐蕃扩张领土,掠夺

人畜,宋则听之任之。一旦宋向吐蕃开拓时,侵犯了吐蕃自身的利益,吐蕃则与西夏为援,共同对付宋廷。”毫无疑问,作为宋蕃合作的主导者,北宋实施各种手段拉拢和同化吐蕃政权中的上层势力。一般而言,宋的诏诱往往以武力为后盾。随着宋夏矛盾的不断升级,西北吐蕃的向背对宋的影响也日益加大。为了迫使更多的蕃部归顺,宋甚至以质纳为手段,1002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纳质来归”。1018年,“缘边诸寨蕃部纳质者七百五十六帐”。事实上,宋对吐蕃的诏诱,剿重于诱,威重于德。宋王朝站在传统中原王朝的立场上,对吐蕃的招抚具有极强的功利性,这注定了宋蕃合作的脆弱与短暂。到宋朝神宗时期,吐蕃的势力逐渐衰落,夏宋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宋朝联合吐蕃共同防御西夏的战略破灭,吐蕃遂成为宋朝攻略的对象。1115年,宋熙河路经略使刘法带兵攻占古骨龙,斩首三千余。次年,宋于古骨龙城筑镇武城,从此“唃廝囉之地,悉为宋郡县矣”。

总之,封建时代中原王朝对周边各民族的经略往往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具有鲜明的时代与阶级特征。北宋前期,宋、夏、蕃三股政治力量间既有合作,也有战争。北宋王朝主要以宋夏关系的变化为契机,适时调整对蕃政策,宋廷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对吐蕃的经制卓有成效,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联蕃制夏的目的。但是,由于宋王朝无法摆脱自身所秉承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华裔观,对吐蕃的招抚也就只能局限于“羁縻属羌,以为藩篱”这种狭隘境地,这影响并最终决定了宋蕃合作及其宋蕃关系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1]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 [2]顾吉辰.北宋时期的吐蕃政权与周邻的关系[J].西藏研究,1991(1).
- [3]杨文,高小强.试论西夏政权对北宋经略河湟区域民族政策的影响[J].宁夏社会科学,2010(1).
- [4][宋]田锡.上太宗恭诏论边事.宋名臣奏议:卷129;边防门·辽夏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6]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正[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 [7][元]脱脱.宋史(卷492)[J].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M].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140-152.

Influence of Amnesty in the Northern So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and Xi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Ya-jing

(Ningxia Institut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ial, Yinchuan, Ningxia, China, 750001)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rise of Xixia forc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ng dynasty changed its policy towards Tubo.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ng dynasty showed its friendliness to Tubo and tried to get support from Tubo in the confrontation with Xixia. The government of the Northern Song offered amnesty to Tubo in the field of military,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got certain effects. Anyhow,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among Song, Xixia and Tubo, the limitation of the time and class, this kind of special relationship was fragile and temporary.

Key words: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Tubo; Xixia; amnesty

(责任编辑 余 目)